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

恩 格 斯

反 杜 林 论



人 民 出 版 社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

恩 格 斯

反 杜 林 论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毕于慧

编辑助理：余 雪 高华梓

装帧设计：肖 辉 周方亚

责任校对：马 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杜林论/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3

(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特辑)

ISBN 978-7-01-018972-7

I.①反… II.①恩… ②中… III.①马列著作-马克思主义 IV.①A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3807 号

书 名 反杜林论

FAN DULIN LUN

编 译 者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1

插 页 4

字 数 373 千字

印 数 00,001-2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01-018972-7

定 价 65.00 元

编辑说明

201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是对世界现代文明进程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人类数千年来优秀文化的结晶,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行动指南,是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为了缅怀和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事业,我们精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时期写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编成《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奉献给广大读者,以适应新形势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的编辑宗旨是面向实践、贴近读者,坚持“要精、要管用”的原则,既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又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和发展科学理论的历史进程;既突出他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指导和有力支持,又反映他们对中华民族发展

前途的深情关注和殷切期望。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包含《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14部著作的单行本或节选本,此外还有一部专题选编本《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所有文献均采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最新版本的译文,以确保经典著作译文的统一性和准确性。自1995年起,由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陆续问世,迄今已出版29卷;从2004年起,我们又先后编译并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收录的文献采用了上述最新版本的译文;对未收入上述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我们按照最新版本的编译标准进行了审核和校订。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采用统一的编辑体例。我们将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时期为一部著作撰写的序言或导言编排在这部著作正文前面,以利于读者认识经典作家的研究目的、写作缘起、论述思路 and 理论见解。我们还为一些重点著作增设了附录,收入对领会和研究经典著作正文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和史料。我们为每一本书都撰写了《编者引言》,简要地综述相关著作的时代背景、思想精髓和历史地位,帮助读者理解原著、把握要义;同时概括地介绍相关著作写作和流传情况以及中文译本的编译出版情况,供读者参考。每一本书正文后面均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以便于读者查考和检索。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的技术规格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相关规定:在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

方；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未注明“编者注”的脚注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注；人名索引的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自2014年以来，由我局编译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陆续问世。这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所收的文献，均已编入《文库》，特此说明。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

2018年2月

编者引言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为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欧根·杜林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领域宣扬的错误观点并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写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部著作最初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名发表,后以《反杜林论》著称。

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通过对杜林宣扬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揭示了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引论》中恩格斯论述了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评述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性;论述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阐明了黑格尔为恢复辩证法这一最高思维形式作出的巨大贡献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实质,揭示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和唯

心史观的本质区别。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功绩,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见本书第26—27页)。

在《哲学》编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他通过对杜林的先验主义的揭露,科学地阐明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指出: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原则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见本书第35页)。恩格斯利用他多年研究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的成果,批判了杜林在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领域的种种谬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见本书第45页);“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见本书第62页);“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见本书第53页)。恩格斯批驳了杜林对辩证法的攻击,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见本书第150页)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的否定规律作了详细的阐述和科学的论证。

恩格斯批驳了杜林在道德和法的领域鼓吹的“永恒真理”、“终极真理”,阐明了人类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论述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

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见本书第91页)。人对真理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见本书第90页);“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见本书第95页)。恩格斯还揭示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见本书第120页)恩格斯还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出发,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和平等观。他指出:没有永恒的、终极的道德教条,一切道德观念都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见本书第99页)。“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同上)平等观念也一样,不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平等观念是历史的产物。恩格斯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与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的根本区别,指出无产阶级要求的“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见本书第112、113页)。

在《政治经济学》编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庸俗经济学,系统阐明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他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见本书第155页)。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材料是历史性的、经常变化的,因此“政治经济学

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见本书第155—156页)。他区分了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经济学,并指出“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见本书第158页)。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宣扬的唯心主义“暴力论”。杜林把政治关系说成“历史上的最基础的东西”,把政治暴力说成“本原性的东西”,认为一切经济现象都应该由暴力来解释。恩格斯认为杜林的观点是那种将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看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的唯心史观的翻版。恩格斯阐明了经济决定政治、物质生产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无论私有制的产生,还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过程,“都由纯经济的原因来说明,而根本不需要用掠夺、暴力、国家或任何政治干预来说明”(见本书第173—174页)。“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才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见本书第170页);“暴力仅仅保护剥削,但是并不造成剥削”(见本书第162页)。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把暴力看做“绝对的坏事”的错误观点,指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见本书第195页)。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驳斥了杜林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的歪曲和攻击,以通俗系统的形式论述了马克

思在《资本论》中阐发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他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功绩,指出:这一理论“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占有方式的机制,揭示了整个现代社会制度得以确立起来的核心”(见本书第218页)。恩格斯还阐明了剩余价值理论这一发现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的。”(见本书第216页)

本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是马克思写的,原稿标题为《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马克思在文中批判了杜林对经济学史的错误论述,阐述了配第、诺思、洛克、休谟等人在古典经济学产生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还着重对经济学界视为“不可解的斯芬克斯之谜”的魁奈《经济表》作了深入的科学剖析,阐明了重农学派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理论贡献。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对经济学史的阐述是“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部分”(见本书第14页)。

在《社会主义》编中恩格斯揭露了杜林的冒牌社会主义,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恩格斯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他批驳了杜林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攻击,科学地评价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阐述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辛辣抨击、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构想,同时剖析了他们的唯心史观和历史局限性,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见本书第

279 页)

恩格斯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指出: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规模发展;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上的反映。”(见本书第 290 页)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见本书第 307 页)。

恩格斯用唯物史观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见本书第 293 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见本书第 293、294 页),这一矛盾还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见本书第 296 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的爆发迫使资产阶级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调整生产关系,如采取股份公司这种社会化形式,把有些部门变成国家财产;但是,“无论向股份公司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见本书第 301 页)。恩格斯强调指出,要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建立“那

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见本书第303页）。为此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上）。

恩格斯还预言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由生产的有计划的组织代替；商品生产将被消除，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生产劳动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为解放人的手段；旧的分工将消失，人将获得全面的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乡之间的对立将消灭；阶级差别和对立将消失；国家将消亡，对人的统治将被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的领导所代替，等等。他还指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见本书第306—307页）。

恩格斯在为《反杜林论》三个德文版写的序言中说明了写作的历史背景和目的，还说明了这部著作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完成的，反映了他们的共同的观点。他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见本书第7—8页）。他在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创立过程时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见本书第9页）他还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

建立在19世纪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

《反杜林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斗争的直接产物。19世纪70年代,柏林大学讲师欧根·杜林以社会主义的行家和改革家自居,宣扬庸俗唯物主义、先验主义、实证主义、庸俗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妄图拼凑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杜林的思想一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产生很大影响,爱·伯恩斯坦、约·莫斯特等都成了杜林的积极追随者,甚至奥·倍倍尔也一度受杜林的影响。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二版(1875年出版)和《哲学教程》(最后一册在1875年2月出版)的出版尤其助长了这种势头。在这两本书中,自命为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猛烈攻击,这促使威·李卜克内西在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致信恩格斯,请他在《人民国家报》上反击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内西把该报拒绝发表的阿·恩斯和约·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给了恩格斯。

早在186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因杜林在1867年12月《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而开始关注他的观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1868年1—3月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杜林观点的批判态度。1876年2月,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中指名批判了杜林的言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54页)。鉴于杜林的思想对1875年5月成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造成的危害,恩格斯决定中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全力反击杜林,捍卫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科学世界观。

恩格斯在 1876 年 5 月 24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马克思于 5 月 25 日回信表示坚决支持。于是恩格斯立即着手这项工作。他在 5 月 28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阐述了他的著作的总计划和性质(见本书第 394—395 页)。

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用了两年时间,从 1876 年 5 月底开始做准备工作,到 1878 年 6 月完成。

《反杜林论》第一编写于 1876 年 9 月—1877 年 1 月。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 1877 年 1—5 月的《前进报》。这一编还包括后来第一次出版该著单行本时抽出来作为整个三编的引论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该书的第二编写于 1877 年 6—12 月。这一编的最后一章即论述政治经济学史的第十章是马克思写的(马克思的原稿《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26 卷),恩格斯作了删节和修改。第二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 1877 年 7—12 月的《前进报》学术附刊和附刊。

该书的第三编写于 1878 年上半年。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 1878 年 5—7 月的《前进报》附刊。

《反杜林论》的发表引起了杜林追随者的不满。1877 年 5 月 27—29 日在哥达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他们力图阻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恩格斯的这部著作。由于他们的影响和干扰,该报发表《反杜林论》时断时续。

1877 年 7 月,这部著作的第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

中实行的变革。一、哲学》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第二编和第三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为题也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在莱比锡出版了《反杜林论》第一版,标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86年该书第二版在苏黎世出版。1894年经过修订的第三版在斯图加特出版。第二版和第三版均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标题。恩格斯为这三个版本写了序言。

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书名讽刺性地套用了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的著作《凯里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书名。杜林在该书中吹捧庸俗经济学家查·凯里,把凯里奉为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导师。恩格斯在1879年11月14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把《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称做《反杜林论》。后来这部著作以《反杜林论》这一书名广为流传,载入史册。

1880年,恩格斯应拉法格请求,把《反杜林论》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编成一本独立的通俗著作,由保·拉法格译成法文并经恩格斯本人审定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出版德文单行本时书名改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称它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743页)。

《反杜林论》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列宁认为,《反杜林论》“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

富、十分有益的书”(见《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1卷第94页),它同《共产党宣言》一样,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同上,第2卷第310页)。

本书附录收入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这些材料有助于我们理解恩格斯在正文中阐述的理论要义。附录还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杜林和〈反杜林论〉的书信摘选》。这些书信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杜林发表《资本论》第一卷书评后对杜林的评论;另一部分是在写作《反杜林论》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杜林思想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围绕该著的斗争所作的评述。

《反杜林论》第一个中译本由吴黎平翻译,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出版;同年上海昆仑书店还出版了钱铁如翻译的《反杜林论》上册。吴黎平的译本后经译者修订多次再版。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央编译局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并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0卷翻译《反杜林论》,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吴黎平的译本。《反杜林论》的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0卷(1971年),编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第3卷(1972年),并出版了单行本。1995年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时又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对《反杜林论》译文重新作了校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中经过重新校订的《反杜林论》译文于1999年出了单行本,并附有《〈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杜林和〈反杜林论〉的书信摘选》。2004年起,中央编译局又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对《反